

編者按

本期《百年中國》三篇文章，都以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為對象。馬悅然認為，與馬克思的《共產黨宣言》、貝拉米的《百年一覺》不同，康有為的《大同書》是在「儒家信仰上建立自己的烏托邦」。陳萬雄考察了五四期間安徽知識分子的活動，再從人物譜系和文化思想的發展淵源及他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，論證了這一代知識分子身兼革命家和啟蒙者的雙重身分，進而對近代史分期等有關理論問題提出新見解。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，陳鼓應通過其與尼采的比較，再現陳獨秀的鮮明個性及內心衝突，特別是對他所從事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「價值重估」，做出具體分析。